



● 牛 军

● 福建人民出版社

从赫尔利 到马歇尔

——美国调处国共

从赫尔利 到马歇尔

——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

● 牛 军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年·福州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
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

牛 军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排版

福建省煤炭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8.75印张 5插页 209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211—00744—3

K·54 定价：2.95元

“伟大的美国梦想” （代序）

1944至1946年是世界历史转折的年代。在这历史转折的年代中，世界进步人类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决定性胜利。猖獗一时的法西斯势力急剧没落，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是以美苏英中为主体的战时大同盟解体，那些在战争中新崛起的各种力量不断调整彼此的关系，它们之间各种形式的斗争此起彼伏，方兴未艾。总之，旧的势力范围已在大炮轰鸣中土崩瓦解，新的国际格局正在动乱与纠纷中形成。

同世界其它地区一样，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远东的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历时四百年的殖民体系分崩离析，欧洲列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一蹶不振；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苦心经营的“大东亚共荣圈”变成了埋葬大和武士的坟场。另一方面，随着

欧洲列强的衰落和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崩溃，远东地区出现了三种重要力量：一是势力遍及亚太地区的美国。它凭借着独一无二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企图取代欧洲列强和日本，在远东独占鳌头。一是在地理上横跨欧亚的苏联。它在世界大战中迅速成为第一流的军事大国，此时为了切身利益，毫不掩饰要在远东发挥巨大影响的决心。第三种力量是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亚洲人民在战争中空前觉醒和奋起，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不可阻遏的力量。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任何在这一地区称霸的企图都是异想天开的。

远东的国际关系从来都是以中国为中心展开的，战后远东的各种矛盾无例外地再次汇聚到中国。远东各种力量的布局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美国一反常态，积极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直接调处国共矛盾，主观上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的选择，以及对包括它自己在内的各种势力的估计和评价；客观上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赫尔利和马歇尔的调处横跨这一关键性的历史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深刻、最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

美国调处国共矛盾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美国对华政策所包含的根本矛盾——实力与目标的差距——的产物。自从美西战争开始，美国十字军就扛着“代表了最广泛的自由、最纯洁的基督教和最广泛的文明”的星条旗，踏上了向西扩张的征途。由于对西班牙战争的胜利，美国掠取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远东的殖民地。在阿拉斯加、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等地摇摇晃晃树起的星条旗，标志着美国的势力范围从此延伸到远东。以往在打开中国门户的过程中，美国不过是步欧洲列强之后踵，别人在前边打开一道门，“美国人就跟着进去”。现在不同了，美国终于取得了进入中国的“踏脚板”和“发展对华贸易的

基地”。1898年，曾任驻华公使的贝文声称：“全世界都把中国看成我们所出产的货物的大好市场。除了日本之外，我们比任何其它商业国家都接近这个市场。在我们面前有着灿烂的前景，它将使太平洋比起大西洋来对我们更显得重要。”美国的政治家们预言：“谁了解了中国谁就能执今后五百年世界政治之牛耳。”美国经济学家则把中国看成是销售美国剩余产品的“最重要的市场”，“东亚是所有富有生气的国家抓住不放的俘获物。”

正当美国兴冲冲地准备跳上中国大陆大干一场时，却迎头碰上列强在中国掀起的割地狂潮。在这场弱肉强食的混战中，美国曾经打算至少占领一个优良的中国港口，以便“能够从那里有力地主张我们（美国）的权利和有效地运用我们的影响。”然而由于美西战争的纠缠，美国在中国取得势力范围的企望终成画饼，于是它便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标榜保全中国领土和行政实体的完整，但实质上试图加以保护的是美国的贸易市场。美国利用“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并几乎获得了其它列强在中国勒索到的一切帝国主义特权。所以它被美国人称为“顺便搭车的帝国主义”，“也有我一份的政策。”^①

“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在中国的目标与实力之间巨大差距的产物，其本意是在美国无力参与瓜分的条件下，要从列强向中国勒索到的每一份供品中都分一杯羹。就此目标而言，美国从未如愿以偿。日俄战争结束后，美国被沙皇俄国和日本携手排斥于中国东北大门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又承认了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一夜之间便把美国苦心经营的华盛顿体系搅得乱七八糟。中国的大门又要被日本关上了。美国当时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除了不断起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中译本）第25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草和公布照会外，并不打算真的干些什么，或者说它还不具备真的干些什么的实力。直到十年以后美国自己的基地挨了炸弹，军舰被炸沉到海底，才手忙脚乱地庄严宣战了。

当日本飞机把炸弹投向珍珠港时，整个远东局势便开始向着新的方向发展。日本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改变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美日不战不和的沉闷局面，粉碎了美国的一切动摇和幻想，促使美国重新大幅度地调整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综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全部军事和外交实践，可以概括为：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取得支配地位，以保证美国工商业在这里有繁荣发展的前景。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自己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潮流，毫无疑问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的美国历史上的空前义举，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为人类免遭法西斯主义蹂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来说既是灾难，也是机会。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美国决策者在战争的火光硝烟之中，似乎已经看到了他们的前贤预言的“灿烂前景”。正是在取得对远东支配权的欲望的支配下，美国自从决心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起，便不断左顾右盼。它在致力于粉碎“大东亚共荣圈”——它一定会被粉碎——的同时，既要警惕苏联势力在战后“从亚洲东北部向外扩张”，又要觊觎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遗产，还要防止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的确，日本战败后，远东不可能真的出现什么等着美国填补的“权力真空”。美国要在远东取得支配地位，势必要与两股势力迎头相撞。首先是在战争中迅速崛起的苏联，由于自身的利害关系，必定要在远东发挥重要影响。它即使不向东发展，也不会漠视美国无限度地向西扩张。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美国日益关注苏联对外政策的动向。舍伍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指出：

“俄国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辉煌胜利，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局面和

瞩目的未来图景。由于这一仗，……俄国以一个大国姿态出现了。……罗斯福已意识到，他现在必须把目光透过1943年的军事胜利而看到将来战后世界的真正事态。”^①战后美苏很可能在远东发生一场针锋相对的实力较量，美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其次是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亚洲人民对殖民制度的深仇大恨日积月累，犹如蓄势欲发的火山，使世界为之颤栗。历时四个世纪之久的“白人帝国”如今已经危若累卵。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积聚着远比欧洲战场复杂得多的矛盾。这里既有起着主导作用的进步人类与法西斯主义的矛盾；也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殖民地的争夺；还存在着亚洲人民反对一切外来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一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饱受殖民统治者的蹂躏，他们就像憎恶“大东亚共荣圈”一样，对一切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方的殖民制度深恶痛绝。美国高举着民主自由的大旗，参加到反法西斯圣战之中，面对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却忧心忡忡。战时曾任副国务卿的韦尔斯指出：“虽然日本试图统治太平洋和亚洲的物质结果可以完全消除，但必须坦率地承认，精神的发展——远东人民中的民族主义的增长——却由于1942年的胜利而极大地加速。”如果西方列强不愿对远东国际关系做基本的调整，在远东“除了一个世纪的混乱和普遍的无政府外，很难预见其它的前景。”^②

为了解决上述两个难题，美国于1943年初制订了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这项政策概括地说就是“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China be a great power）”。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赫尔在回忆录中说明，美国曾经设想靠美英日之间达成协议，来维持太平洋的均势，

^①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中译本）下册第325～32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版。

^② 韦尔斯：《作出决定的时刻》（英文版）第297～299页，纽约，1944年版。

但战争改变了那里的格局。战后，“日本作为东方大国，将在很长时间里消失，因此唯一主要的大国将是中国。美国、英国和俄国也都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但每一方的重大利益都在别的地方。结果为了使远东稳定，不得不使中国参与任何达成的协议”。“如果中国也不行了，太平洋就不存在稳定的手段了”。^①显然，所谓“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不过是要使中国成为支撑美国在远东的主导地位的台柱子。罗斯福曾经把美国执行这一政策可能获得的好处解释得一清二楚。1943年初，他告诉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而将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②罗斯福还向韦尔斯说明，他“感到承认中国居于四强的地位，将足以阻塞白人控制世界的攻讦的口实”，并且“一个稳定的中国，对苏俄在远东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也可以当作一种最有价值的向心力，以限制亚洲革命暴乱的影响。”^③可以说“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政策形成伊始，便着眼于战后独占远东，限制苏联，服从于美国长期以来争取影响和控制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企图。当然，强调美国制订这个政策的着眼点在战后，并不等于否认这个政策曾经起到过加强和鼓舞中国抗战的政治和心理上的作用。

“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是“门户开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门户开放”政策得以产生的矛盾——目标与实力的巨大差距的产物。美国的“主要利益”不在远东，它也没有能力同时兼顾欧亚两大洲的财产，于是需要一个符合美国标准的“统一强大的中国”，使之能发挥“警察”的作用，为美国照看好亚洲的“羊圈”。问题在于，当罗斯福的头脑中形成“使中国

①赫尔：《赫尔回忆录》（英文版）第1586～1587页，纽约1948年版。

②艾登：《艾登回忆录》（中译本）中册第687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③韦尔斯：《影响历史的七项决定》（英文版）第186页，纽约1950年版。

成为强大的国家”的幻想时，美国正面对着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既不“统一”、也不“民主”、更谈不上“强大”的局面。然而罗斯福宁愿相信居里编造的神话，即“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委员长（指蒋介石）”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完全信赖”蒋介石会按照美国的愿望，“推行一项有力的战争政策，并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和民主的强大国家”。罗斯福并非对神话和谎言缺乏洞察力的昏庸之辈，但他有时需要它们来安慰自己，并说服别人追随他的政策。因此他也半闭着眼睛信口宣布：“中国在过去——约半个世纪以来，已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主国家之一。”^①为了证明这种胡诌千真万确，美国从提出“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开始，便不遗余力地着手在国际上把中国塑造成美国想像中的形象。

1943年1月，美国宣布取消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随后罗斯福通过批评史迪威，统一了美国军政首脑的意见。3月，他告诉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艾登，中国将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特殊作用。艾登立即表示，英国“不那么喜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跑上跑下的想法”。罗斯福郑重其事地宣布，“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加强中国”，并且对邱吉尔未能在某次演讲中把中国排入大国行列“表示遗憾”。邱吉尔为此尖酸地抱怨美国是用“收买无资格投票人，使他具有选民资格，来为自己投票出力的办法，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②4月间，霍普金斯告诉宋子文，罗斯福认为“中美间此时已无须再非正式讨论原则，尽可与美方正式商谈远东各种实际问题，及中国对世界集团之意见”。^③

①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外交政策》（中译本）第558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②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第504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③《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第一册第159～160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

1943年10月，美国军政首脑在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开会讨论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罗斯福在会上强调，签署任何有关战后的协议，必须“包括中国”，“哪怕这个时候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赫尔不断向莫洛托夫施加压力，迫使苏方承认美国赐给蒋介石的头衔。赫尔告诉莫洛托夫，美国打算鼓励中国继续战斗，并希望中苏两国“能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分歧。他还在私下会晤中表示：美国不可能忽略中国，否则很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发生最可怕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影响”，美国将不得不调整政策，以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保持适当的稳定”。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认为：赫尔的话是“明显地暗示，目前对俄国的援助，其中某些部分可能拨给蒋，除非允许中国签署四大国宣言”。^①当莫洛托夫继续拒绝美国的建议时，赫尔竟以中断会议，空手而回相要挟，直到斯大林作出让步才罢手。为了使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及时获准代表中国在会议拟定的宣言上签字，赫尔主动向傅秉常提供美国的电台。在美国的有力支持下，国民党政府终于得以在四国宣言上签字。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结束后，美国既然已经迫使英国和苏联至少在形式上接受了它的政策，剩下的就是把蒋介石拉上战车了。11月22日至26日，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召开三国首脑会议。罗斯福一本正经地接待了“四强”大厦的第四块“基石”；蒋介石也煞有介事地与他谈论起远东的未来，好象他们真的是在平起平坐地决定远东的命运。在23日的会晤中，罗斯福告诉蒋介石：“中国应该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订该机构的一切决定”。蒋介石对罗斯福的恩赐表示“欣然地”接受。罗斯福和蒋介石一致同意，日

^①哈里曼：《特使》（中译本）第264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

本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他们强调：“经谅解，辽东半岛及其两个港口，即旅顺和大连必须包括在内。”罗斯福提出：美中在战后应互相合作，反对“外来侵略”；美国应在太平洋地区保持足够的军队，以便有效地承担“责任”。蒋介石表示希望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使其“能履行国际义务”，并允许美国使用旅顺港。^①此外罗蒋还就美国援华、中苏边界和远东其它国家的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

通过开罗会议，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确定了双方在远东的战略关系。罗斯福终于在国际上实现了美国的政策目标。他相信开罗会议“不仅在今天和不久的将来取得成果，而且今后几十年也会产生效果”。蒋介石认为：开罗会议“以政治的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他通过宋美龄告诉罗斯福，他已“无法找到颇有意义的话来表达内心充满着“感激之情”。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和蒋介石为他们的杰作弹冠相庆。1943年圣诞节前夕，罗斯福发表致美国人民书，宣布美国和中国“在深厚的友谊和在统一的目的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密切”。美国国会同时宣布废除歧视华人的排华法律，以便进一步证明，美国“不仅视中国为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②12月3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把开罗会议说成是“转移了世界人类的命运，重写了世界历史的新页”，“开罗会议的决策，乃是美国远东政策最鲜明的结晶；……代表了全人类的最大希望，也给予了全世界以无限光明”，而且“世界人类历史的新页是在开始编写了”。^③总之，似乎没有开罗会

①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447~4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0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③ 《中央日报五十年社论选辑》第31~35页，台湾《中央日报》社1978年12月版。

议，历史就会永远在原地踏步。

全面评价开罗会议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它就象“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这个政策一样，毕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英勇不屈，浴血奋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且开罗会议及其发表的《开罗宣言》无疑具有反法西斯的性质和积极意义，曾经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但当我们从回顾历史的角度观察罗蒋会谈的影响时，不能不指出它具有相当严重的性质。23日会谈的结果表明，罗斯福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把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同国民党政府捆在一起，决心与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排它性的准政治军事联盟。美蒋战略关系的确立，刺激了美国在远东的胃口，驱使它更多地向国民党政府投资，从而使美国在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方面逐渐失去了选择余地，使美国对华政策沿着岌岌可危的轨道一直走到翻车为止。蒋介石则根据与美国结盟的性质确信，不论他需要什么，美国“都会照办”。许多年以后，戴维斯不无感慨地评论美国远东政策这块“结晶”说：“美国几乎是在达到战时顶峰之际，在与国民党中国的关系方面被拴住了。”这绝不是事后诸葛亮。就在罗斯福兴致勃勃地在国际上捏造“新的中国”时，中国的现实已经把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部矛盾暴露得淋漓尽致。

盟军从1942年底至1943年初在军事上取得的辉煌胜利，引起了世界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动，各种政治力量均感受到这种变动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法西斯势力惧之，民主力量喜之，也有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国民党的反应是蒋介石出版他的《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标榜“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声称：中国今后的命运决定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国力之能否集中”。他指斥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是“武力割据”和“封

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并公然宣布如果中共不放弃“武力割据的恶习”和荡涤“封建军阀的观念”，国民党一党统治“就一日不能终结”。《中国之命运》的主旨是力图奠定一种理论基础，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钦定中国未来的命运。它是向中国民主力量发布的宣战书，具有为发动内战作思想和舆论准备的严重性质。《中国之命运》的问世表明，蒋介石在该书所阐述的思想支配下，势必坚持法西斯独裁统治，并早晚走上发动反共内战的道路。《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仅两个月，国民党便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掀起一阵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浪潮。与此同时，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频繁调动，使西北国共对峙的地区顿时出现剑拔弩张的气氛。整个1943年夏季，国共关系又一次处于危机状态。

1943年夏季发生的国共危机严重冲击了盟军的对日作战计划；并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使远东的政治局势为之震动。这次国共危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揭示了国共关系对远东政治形势的影响。它犹如一道催化剂，加快了美国政府对华内部问题的反应过程。

最早试图从政策角度探讨美国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尴尬问题的是以戴维斯和谢伟思为代表的一批驻华外交官，他们被称为美国国务院里的“中国通”。他们的探索几乎与罗斯福提出的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的目标同步。当罗斯福决心让蒋介石作为大国俱乐部的名义会员时，“中国通”们就开始观察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能否承担美国赋予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他们的探讨也开始于国共矛盾尖锐化的时刻。国共矛盾的充分展开，促使他们逐步把握到中国内部问题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而他们独具的广阔的背景知识、丰富的实地考察经验和冷静深刻的分析力，使他们能够迅速抓住美国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中，美国驻华军政人员最关心的是中国能否继续打下去。他们普遍认为，援助国民党政府是维持中国战场的主要方式。但是，国民党政府是否有能力有效地利用美国的援助对日作战，却值得怀疑。因此美国政府应有意识地将美援作为制约蒋介石的手段。他们提醒美国政府，蒋介石的胃口很难被满足，不论增加多少援助，都不会被他认为是“实质性的”，在中国战场发动任何进攻，“必须由盟军提供外国军队承担”。美国能得到的唯一报偿，是国民党军队“占领敌人撤离的地区和巩固他人取得的进展”。由于“国民党是保守的政治势力的集团，在国民党的存在着法西斯思想”，美援还会起到支持国民党政府中的腐败分子的作用。1942年8月，史迪威提出对蒋介石实行“讨价还价政策和压力政策”，既不是他个人好恶的产物，也不是他偶然迸出的思想火花，而是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对国民党政权保存实力的本性认识的间接反映，是他们对国民党消极抗战政策极度不满的一种发泄。

1943年间，随着远东军事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内部国共矛盾的尖锐化，美国驻华外交官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开始达到新的深度。他们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因论据充实和论点深刻而引人注目。他们认为美国在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1）国共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发展成为一场内战，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国民党由于其本性和弱点，很可能成为失败者；（2）国共斗争反映着远东不同营垒的对立，必定要严重影响美苏在这一地区的关系，决不能等闲视之；（3）面对中国现实，美国必须调整无条件片面援蒋的政策，否则它在中国的“巨大努力”将付之东流。最现实的途径是首先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必要的联系，以便控制住中国的政治局势。总之，美国在中国已经到了改弦易辙的关键时刻，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处理国共矛盾。“中国通”们的报告揭示了

美国对华政策的症结，撬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合乎逻辑的问题是，一个既不愿意积极同日本侵略者打仗，又不统一，也不民主的政权，能够成为远东稳定的基础吗？美国政府为什么在高举民主自由之旗同法西斯作战之时，一定要对一个带有浓厚的封建法西斯色彩的政权那样垂青？美国难道没有别的选择吗？“中国通”们的报告的确比较客观和全面地反映了战后远东各种力量的基本布局、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态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此重要而又强烈的信号，势必要在美国决策者那里引起反馈。

1943年9月，罗斯福在与副国务卿韦尔斯谈话时，对国民政府的情况深表不满。他认为国民党政府“极端腐败”、“没有行政效率”，“对于广大中国人民的苦难漠不关心”。罗斯福表示特别担心“日本战败后，在中国又燃起内战战火。危险在于，苏联将插手支持共产党，西方世界也将被引诱或被迫为自己的利益而支持国民党”。那时就会出现“西班牙内战时所见到的形势，只是规模更大，更危险”。因此“战后中国是最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① 赫尔也同样感到美国的援助如果没有国民党政府的配合，不可能自行产生效果。可国民党政府“被反动集团统治，只为自己谋利、贪污和无效率”。如果国民党政府象韦尔斯形容的那样，“在内战和无政府状态中无限期的打滚”，那美国在中国的一切努力只能是枉费心机。

但是，既然罗斯福已经打定主意并且已经付出巨大努力，要让蒋介石为美国在亚洲拉车，而且美国正在把军事援助作为能赚取红利的投资提供给国民党政府，他当然不会轻易抛掉想象中的那个能使列强在远东保持平衡的法码。罗斯福肯定知道他是在冒险。他曾经告诉斯大林：他坚持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并非因为他不了解中国目前的软弱地位，而是他的目光更远处瞩目于未

^① 韦尔斯：《影响历史的七项决定》（英文版）第151页，纽约1950年版。

来”。^①罗斯福为了看到他的那个“未来”，决心要——作为美国处在巅峰时期的总统，他相信美国有这个能力——化险为夷。

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实际上是沿着两条思路同蒋介石打交道的。一是确立美蒋之间的战略关系，把蒋介石同美国——也就是把美国同蒋介石——牢牢地拴在一起，以取得和巩固美国在远东对其它大国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是迫使蒋介石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按照美国规定的方针，处理他在国际和国内面临的各种问题。

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就中国内部问题进行的讨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但从他同他儿子的如下谈话中，却可以窥见其基本想法。罗斯福说：国民党政府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政府”，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有打仗”。虽然蒋介石以军队没有训练和缺乏装备为自己辩解，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拒绝史迪威的改革计划，并以大批军队包围“红色中国的边境”。罗斯福对蒋介石尽管有诸多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因为蒋介石夫妇固然“有许多缺点”，美国“却不得不依靠他们”。关于中国共产党，罗斯福相信蒋介石指责它不抗日是撒谎。他充分了解“大部分中国海岸”控制在中共手中。为了解决国共之间的纠纷，罗斯福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他还提醒蒋介石：美国“不会陷入那里（中国）的任何内战的陷阱里”。^②

继在国际上把中国抬到“四强”之一的位置上之后，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实际上也为中国的统一确定了一个模式。蒋介石虽然有缺点，但却不能取代他；中国共产党是愿意抗日的爱国者，

^①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1943年”，第532页。

^②埃利奥特·罗斯福：《耳闻目睹》（英文版）第142、163~164、249~250页，纽约1946年版。